



列宁家书集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家 書 集

1893—1922 年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弗·伊·列宁
1897 年

中文本出版說明

列宁給親屬的信是珍貴的史料，从这些书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列宁的生活方式，他的习惯和爱好，他对人的态度等等，而关于列宁的这些方面，正是我們从别的有关列宁的书籍中看不到的。因此，为了便利閱讀起見，特根据“列宁全集”第37卷所載，将这些书信印成单行本（譯文与全集中文本相同）。

列宁在1893—1922年間給親屬的私人书信、电报和便箋，有很大一部分沒有保存下来，本书編入的仅是一部分，共計274封。书前刊載的瑪·伊·烏里楊諾娃和安·伊·烏里楊諾娃所写的两篇序言，对列宁家书的内容和意义作了詳尽的闡述。

本书附录中所收54封克魯普斯卡婭的信，談到列宁在流放地和侨居国外时的生活情况，并对列宁书信中的若干事实作了說明。

据“列宁全集”第37卷的卷首說明，全部书信都是按年代編排的；寄自俄国的信件，日期用旧历，寄自国外的則用新历；凡是列宁署有日期的信，日期的形式都保持手稿的原状；手稿里沒有署明日期的，則由編者注在信末。

1930 年俄文版序言

本書所收的書信，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給母亲瑪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和妹妹瑪丽亚·伊里尼奇娜的^①，包括的时期是从1894年至1917年^②，即从弗·伊·进行革命活动的最初几年起，至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止。这个将近25年的时期是我們党出現、形成的时期；而在这光荣的25年当中，弗·伊·一直是这个党的領袖，他领导着党，培育着党。他整个一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度过的，他个人的一切也是同这个斗争、同为无产阶级事业所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虽然現在出版了“列宁全集”，发表了相当多的論述列宁主义

① 不过从内容看，这些信通常都是“为了不重复起見”写給我們全家的，至少是写給当时住在一起的一家人的。

② 这里不包括弗·伊·在流放期間的家書（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9年第2—3、4、5、6和8期）和1896年的家書。1896年，弗·伊·被監禁在彼得堡的拘留所（从旧历1895年12月9日至1897年1月29日），經常同母亲和姐妹們見面，同他們的私人通信很少（見安·伊·叶利札罗娃-烏里楊諾娃“弗·伊·在獄中”一文（“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3期）和附在該文后面的1896年弗·伊·的两封信）。从1905年11月至1907年12月，弗·伊·住在列宁格勒或芬兰，經常同家人見面，差不多沒給他們写过信。此外，还有許多給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瑪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的信，特别是当瑪丽亚·伊里尼奇娜住在国外的那几个时期，这些信将另行发表。（瑪·伊·烏里楊諾娃所提到的列宁的書信已編入本書。——編者注）

的著作（包括科學研究著作和通俗著作），但是關於列寧的鮮明的多方面的個性，至今還描寫得很不夠，或者說幾乎完全沒有描寫出來。

向讀者提供的這些書信部分地彌補了這個缺陷。從這些信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伊·的生活方式、他的習慣和愛好、他對人的態度等等。我們所以特別指出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因為這些信件遠不是他在上述時期所寫的全部家書。由於家庭經常遷來遷去，同時我們家裡的人經常不是這個就是那個遭到搜查和逮捕，他的許多書信有些是落到警察手裡沒有退還^①，有些就丟失了。在郵寄過程中書信丟失也是常有的事，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因此，往往同一個問題連續在幾封信中重複提到。此外，這些信件還帶有沙皇專制時期警察迫害的烙印。不錯，當時我們凡是通信談工作（報告革命事件、黨的生活等等），都是用秘密方法，用化學藥水寫信（通常是寫在書籍和雜誌里），把信寄到外人的“清白的”通訊處去^②。但是個人的一切同革命工作聯系得是這樣密切，所以私人的合法信件無疑也會受到警察迫害這一因素的嚴重影響，使我們在寫信時不得不大打折扣。弗·伊·往沃洛果達給妹妹瑪麗亞·伊里尼奇娜（當時她流放在那裡）去信時就曾這樣寫過：“在我們（特別是你和我）所處的情況下，隨意寫信已經很困難。”

① 例如，我們在中央檔案館發現了弗·伊·的6封信的摘錄，這些摘錄附在莫斯科憲兵局案卷的後面，作為“物証”。我們已把這些摘錄編入附錄。（見本書第530—531頁。——編者注）

② 當時在俄國保存這些信件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在國外留下副本的一部分信件保全了下來。

不仅同瑪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是这样，同我們全家人写信也都是这样；因为他們同弗·伊·不仅是亲屬关系，而且观点相同，信仰相同。他們大家（包括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馬·季·叶利札罗夫在內）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屬於党的革命派，他們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时刻关心党的生活，与党同甘苦，共患难。就連我們的母亲，虽然她生于1835年，到90年代末期我們家里的人遭到特別頻繁的搜查和逮捕的时候已經是60多岁的人，也十分同情我們的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者的全部合法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所以，在談到我們所关心的問題，回信說某封秘密信件已經收到以及詢問熟人的情况等等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暗語、暗号之类的东西。

讀者将会看到，在弗·伊·直接寄給母亲、姐妹或弟弟的信中几乎没有提到什么人的姓名，因为在信中如果提到別人的姓名，就会給別人招来麻煩。当然，我們是絲毫不願意給任何人带来一点点麻煩的。如果在弗·伊·的信中仍然能看到一些同志和熟人的名字甚至姓氏，那只是因为反正警察局已通过种种情况（同案流放过，同校学习过等等）知道我們和他們認識，或者因为純粹是事务来往（这时写了出版人、書商等等的姓氏）。为了避免在信中提到具有一定合法身分的熟人的姓名，所以弗·伊·要想談到他們，問候他們，总是用綽号，或者用一件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作个暗示。例如，弗·伊·把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称为“历史学家”（因为他有一些历史問題的著作）；当时弗·伊·通过安·伊·和瑪·伊·同他常有信件来往^①。

^① 可惜这些通信保存下来的只有1909年12月16日的一封信。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113—119頁。（列宁同伊·伊·斯克沃尔佐

弗·伊·在問候和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同時流放在沃洛果達的瓦·瓦·沃羅夫斯基時寫道：“向波蘭朋友們問好，並希望他們竭力給以幫助。”“中國旅行家”是指阿·巴·斯克略連柯，他當時在滿洲的鐵路上工作；“去年和我們一道划船的先生”，是指維·亞·列維茨基；等等。

在提到郵寄的秘密報刊、秘密通訊稿和寫有化學葯水信件的書籍時，也要用隱喻。

1900年12月底，本文作者曾托出國的格·勃·克拉辛把“社會革命黨宣言”轉寄弗·伊·。為了不被發現起見，就把宣言夾在一個照片簿里。這個郵件使弗·伊·非常高興，他在1901年1月16日的信中寫道：“多謝……給我寄書，尤其是托表兄從維也納轉寄來非常美麗和有趣的照片簿；我希望能經常收到這樣的禮物。”

“火星報”及其他秘密出版物寄往俄國的時候，有時是裝在寫着“清白的”、合法的通訊處的封套里。我們還利用這些通訊處作為自己接收書刊的地方。所以，在合法的信件里有時就通知某個郵件已經寄出，以便我們能及時向收件人查問。下面這一段弗·伊·的話（1900年12月14日的信）顯然就包含着這樣的意思：“記得在9日給你寄去了一個你喜欢的小玩意兒。”娜·康·在1916年2月8日的信中寫道：“沃洛佳收到你那封長信非常高興。希望以後多少再寫一些。”我們的合法信件從來都寫的不長，而且這封信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寫的，當時我們通信主要用明信片，而且是掛號的明信片（因為許多信都寄丟了），所以上面這一段話顯然

夫·斯切潘諾夫的通信保存下來的有兩封信——1909年12月2日一封，12月16日一封。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418—422頁和第16卷第113—119頁。——編者註）

是指写在書里寄去的秘密信。

1900年弗·伊·侨居国外之初，还不知道是否能在国外站得住，当时他为了保密起见，就没有把他本人的通信地址告诉我们，所以当他住在瑞士或慕尼黑的时候，我们给他写信都寄到巴黎或布拉格。例如，他在1901年3月2日的信中写来一个新地址的时候附带说：“我已随房东迁居。”弗兰茨·莫德拉切克（我们的信都寄给他）当时的确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弗·伊·却继续住在慕尼黑的老地方。

弗·伊·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办事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一切开支用度尤其自己的用度极为节俭。看来这些品质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弗·伊·的性格在许多方面都象母亲。而我们的母亲按母系说是德国人，这些性格特点在她身上是很突出的。

从1895年10月5日弗·伊·的一封来信^①中，可以看出他用钱是多么节省，在自己的用度上是多么节俭。

“现在，我在圣彼得堡已开始记流水账，看看自己实际上要花多少钱。结果，在8月28日到9月27日这一个月里，一共花了54卢布80戈比，其中还不包括买东西的钱（约10卢布）和我可能要办理的一件诉讼案的费用（也是10卢布左右）。当然，在这54卢布中，有一部分不是每个月都要花的（套鞋、衣服、书籍、账簿等等）；但是，即使除去这部分（16卢布），我仍然花得太多了：一个月用去了38卢布。显然，我过得不够节俭，例如单是乘有轨马车一个月就花了1卢布86戈比。以后对环境渐渐习惯了，我就会少花些钱。”

^① 这里说的是1893年10月5日的信（见本書第1—2页）。——編者注

果然他就节省起来，特别是当他自己没有收入，不得不接受“救济”（这是他对母亲给他汇去的款项的称呼）的时候。他自己俭省到这种地步，甚至当1898年住在彼得堡的时候连一份“俄罗斯新闻”^①都没有订，而是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两星期以前的”。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找到工作以后，也许会订一份。”

弗·伊·一生都保持着这个特点。不仅是当他在俄国没有收入的时候，也不仅是当他侨居国外找不到出版人出版自己著作（例如他的“土地问题”一书就曾经整整放了10年，直到1917年才问世），有时简直陷于危急境地的时候（1916年9月他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信^②就是一例），而且当他的物质生活完全有了保障，也就是说在1917年革命以后，他的这个特点也表现得非常鲜明。

不过，有一个方面弗·伊·很难节约，那就是在书籍方面。他为了熟悉国内外种种政治、经济和其他情况，需要阅读大量书籍，才能进行写作。

他在1895年8月29日从柏林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最使我吃惊的是，我的经济又‘困住’了：买书等等的‘彘头’这样大，鬼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尽力减少开支，主要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去工作，而且这样还可以使他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得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环境，摆脱人来人往和谈起来就没有个完的环境，因为侨居国外的人大都对异乡不习惯，感到苦闷，所以都喜欢找人谈心。

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的时候，弗·伊·也常利用图书馆来工作。他在彼得堡的时候曾写信告诉母亲，说他很满意自己的新

① “俄罗斯新闻”是当时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中最正派最吸引人的一家报纸。

②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卷第223页。——编者注

住处，因为这地方“离中心区不远（例如，到图书馆只要走 15 分钟）”。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甚至利用在莫斯科逗留了不多几天的机会到鲁勉采夫博物院去工作。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待轮船开航前往米努辛斯克县的时候，他也曾利用尤金图书馆进行研究，虽然每天都要跑上 5 俄里左右。

在流放地是根本谈不上图书馆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弗·伊·要我们设法把图书馆的书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们做过几次这样的试验，但是邮寄时间太长（来回要一个月左右），而图书馆借书是有一定期限的。

但是以后弗·伊·有时还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他在 1914 年 2 月 11 日给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①中写道：“关于 1905—1908 年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汇编，请不要买了（用不着买，太贵了），从图书馆（律师公会图书馆或国家杜马图书馆）给我借一本寄来看一个月好了。”

弗·伊·在国外时也经常利用图书馆。在柏林时，他在皇家图书馆进行了研究。在日内瓦时，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心爱的“俱乐部”（《Société de lecture》^②），这个“俱乐部”有一个图书馆，要在这个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必须报名加入“俱乐部”并交一定的会费（会费当然不多）。在巴黎时，他在国立图书馆进行研究，不过他这个图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糟”；在伦敦时，他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研究；只有在慕尼黑时他才深以“这里没有图书馆”为憾事。另外就是在克拉柯夫时他很少利用图书馆。他在 1914 年 4 月 22 日给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信的摘录是我们从警察司的案卷中找到的（见本书第 489 页。——编者注）。

② “读书协会”。——译者注

瑪·伊·烏里楊諾娃的信中寫道，“這裡（在克拉柯夫。——瑪·烏·）……圖書館很糟糕，而且對讀者極不方便，即使是這樣的圖書館我也幾乎沒有機會去……”當時他要辦報（“真理報”），要同來到克拉柯夫的同志們（到克拉柯夫來的同志比到法國或瑞士去的要多得多）打種種交道，要領導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工作，要開黨代表會議和工作會議等等，這些工作消耗了他很多精力，使他拿不出很多時間來從事科學研究。即使在這個時候，弗·伊·也來信這樣說：“我們常常想念日內瓦，在那裡工作做得多些，又有方便的圖書館，生活不是那樣不安和雜亂。”

弗·伊·在帝國主義大戰初期在加里西亞被捕獲釋以後又到了瑞士，他來信說：“這裡的圖書館很好，在利用圖書方面我很滿意。終日辦報的時期結束以後，讀讀書是很愜意的。”後來他又和娜·康·從伯爾尼到蘇黎世，目的之一就是“在當地的圖書館進行一些研究”。因為這些圖書館，據他說，“比伯爾尼的圖書館要好得多”（但與此同時，他還同樣緊張地進行政治工作，黨的工作；不久前發表在“列寧文集”俄文版第11卷上的弗·伊·在這個時期同卡爾賓斯基和拉維奇兩同志的通信^①也明顯地反映了這個情況）。弗·伊·僑居國外時雖然在閱讀外國書報雜誌方面條件很好，可以到圖書館去借閱，但是俄國書籍卻總感到非常缺乏。他在1902年4月2日的信中寫道：“在這裡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德文書，德文書不缺。這裡所缺的就是俄文書。”他在1900年4月6日的信中又寫道：“很少看到新書。”毫無疑問，弗·伊·在國外由於手邊經常缺少所需要的書籍，他的工作是受到不小的影響的。因此他

① 這些通信的一部分已編入“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編者注

在家書中常常要求家里的人給他寄工作所需的各種書籍（統計材料、有關土地問題、哲學問題等的書籍），以及新書、雜誌、小說等等。從這些信中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伊·在某段時間內對哪一類書籍感到興趣，他運用這些書籍進行哪些研究。

在這些書籍中，他特別重視各種統計資料匯編。

弗·伊·非常重視統計，非常重視這些“確凿的事實、无可爭辯的事實”^①，這一點從他的各個著作中，從他為這些著作所寫的草稿、所做的摘錄和計算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他有一篇論述“民族運動的意義和作用，民族運動和國際運動的相互關係”問題的沒有完成和尚未發表的文章“統計學和社會學”（署名：普·皮留喬夫，這是弗·伊·為了便於出版這本書而用的新筆名），也足以說明這一點^②。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一段話：

“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每一個個別的情況都是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發生的。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繫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應該設法根據正確的和不容爭辯的事實來建立一個可靠的基礎，來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國家所恣意濫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論斷比擬。要這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279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278頁。——編者注

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而且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①

在1902年4月2日的来信中,弗·伊·要求把他过去在西伯利亚所用的書籍里面的“全部統計材料”^②都給他寄到国外去,他說他对这些材料“有些想念”……后来,为了从各个城市更經常地得到統計材料,弗·伊·甚至专门写了一封申請書^③給1909—1910年冬在莫斯科举行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的統計学家(这个代表大会設有一个統計学家小組),提出了要求。这个申請書发出后,得到了許多省的統計学家的答复。弗·伊·在1910年1月2日的信中写道:“我又收到了一封从梁贊寄来的有关統計資料的信,这真是太好了,看来,我将会得到許多人的帮助。”

在1908年弗·伊·写作“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的时候,曾訂閱切尔帕諾夫教授論述阿芬那留斯和他的学派的小冊子,有关“內在哲学”的小冊子,以及其他等書。关于他的这部著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279—280頁。——編者注

② 弗·伊·写作“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一書时所用的这些統計材料是列宁研究院在1929年和弗·伊·的其他書籍一起从国外得到的。根据这些書中的摘要和批注,还可以做出許多有关伊里奇的著作的重要結論。(列宁的“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一書的准备材料,有一部分已載入“列宁文集”1940年俄文版第33卷。——編者注)

③ 这个申請書得以发表,还得归功于把这份申請書保存在案卷里的莫斯科宪兵局。(写申請書一事見本書第419頁。——編者注)

作，他在給妹妹的信中說道：“我對馬赫主義者已經研究了很多，我認為，他們（“經驗一元論”也包括在內）種種鄙俗透頂的見解我現在都弄清楚了。”

弗·伊·在來信詢問是否收到論述現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①的手稿時這樣寫道：“我認為這部經濟著作非常重要，迫切希望它能儘快地全文發表出來。”（見1916年10月22日的信）大家知道，他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雖然他曾“盡了最大力量使文章符合‘嚴格的限制’”（見1916年7月2日給米·尼·波克羅夫斯基的信^②）。他的著作遭到了一系列的改動和刪節，過了10年以後才以本來的面目出版問世。

從弗·伊·的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在什麼情況下動手寫“現代農業的資本主義制度”^③這部著作的（這部著作尚未出版）。他在1916年10月22日給妹妹的信中寫道：“你來信說：‘出版人希望把“土地問題”印成書，而不是印成小冊子。’這大概是要我把續篇寄去（也就是說，除了已寫完的美國部分，還要寫業已答應的德國部分）。等我把老出版人預約的稿子寫完後馬上就動手寫這一篇。”這部著作的手稿現在保存在列寧研究院，沒有寫完，顯然是革命“妨礙了”他寫完這部著作。

收入本書的這些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弗·伊·的寫作的情況和條件，反映了為了發表這些著作所碰到的種種困難。我們所指的是他的合法著作。在這方面，弗·伊·在革命前的整個時期（不包括第一次革命時期和1912—1914年“明星報”和“真理報”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179—297頁。——編者注

②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卷第213頁。——編者注

③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420—441頁。——編者注

时期,当时他还有可能为合法的报纸写作,当时党也有自己的合法的出版机关,虽然为时很短)的处境都是很坏的,这不仅由于他侨居国外,总是缺少所需要的俄国书和其他材料等等原因,书报检查制度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弗·伊·所写的文章常被删削和窜改(例如“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所出的书常被没收(“土地问题”第2卷),这样的事是不胜枚举的。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和俄国隔绝,不能和出版社等等直接取得经常的联系。例如,他曾多次想为“格拉纳特百科全书”写些东西。1914年12月22日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能为百科全书写点东西就好了,但是,如果没有机会认识编辑部的秘书,就不容易办到。”当时没有人认识这些人,当他直接写信给格拉纳特编辑部时,有时甚至得不到回音,或者很迟才得到回音。他在1915年2月给妹妹的信中说:“不能再为百科全书写点东西。我曾写信问过秘书,但是没有回音。”^①他在1912年又写道:“很遗憾,我现在在这里和出版社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

如果不是同志们和亲属们极力帮助弗·伊·寻找出版人,校对他的著作,这些著作就更难出版问世。但是姊妹和弟弟并不是始终都能帮助他的,特别是当他们坐牢或流放的时候。例如在1904年他曾向母亲要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的地址,说有“出版方面的事情”找他(见1904年1月20日的信)。

弗·伊·善于埋头苦干,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但是他也善于

① 当时其他出版人给弗·伊·的回信情况也都不太好。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列宁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第三封信(1901年11月27日),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326页。(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6卷第75—76页。——编者注)

抓住机会休息。他的最好的休息就是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到清靜的地方去。“在这里（指芬兰的斯提尔苏甸，他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回来后由于“非常疲乏”而在那里休息。——瑪·烏·）休息得太好了，游游水，散散步，清靜安閑。清靜安閑对我來說比什么都好。”在那里休息得的确非常好，莉迪婭·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維奇对他非常照顧和关心，后来他还常常想起这个地方，他在給刚生过重伤寒的瑪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最好現在就把你送到斯提尔苏甸去！”

弗·伊·酷爱大自然，他不管去到什么地方，在来信时总是常常描写那里的风景。他在 1895 年去瑞士途中給母亲的信中說：“这里的风景使人应接不暇。一路上我都在欣賞。过了我給你写信的那个德国車站之后，就看見連綿不断的阿尔卑斯山，湖泊一个接着一个，使我簡直离不开車窗。”他写信給瑪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說：“我常散步，現在在这里散步是不坏的，在普斯可夫（以及它的近郊）看来也有不少风景优美的地方。”他从国外来信說：“最近……我常在一个非常美丽的湖上……划船，风和日丽，景色迷人……”“最近我在这里和娜嘉以及另一位朋友去薩勒夫山作了一次极为愉快的旅行。山下边日內瓦一片云霧，朦朦朧朧，而在山上（海拔約 1 200 公尺）則是灿烂的阳光、白雪、雪橇，儼然是一个俄罗斯的美丽的冬日。山下是 la mer du brouillard，——一片云霧的海洋，除了山峰之外，什么都看不見，而且只有那些很高很高的山峰才浮現出来，連小薩勒夫山（海拔 900 公尺）也整个淹沒在云霧里。”他在 1902 年 9 月 27 日的来信又說：“我和娜嘉已經游覽了近郊的許多地方，并且发现有些地方异常幽美。”在弗·伊·的来信中还有这么一段話，看来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說：“这里